

# 「中共、美、蘇三角關係發展趨向」學術座談會紀要

本中心國際共黨組

一、時間：民國七十四年十月三十日下午一時四十分至四時十分。

二、地點：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二樓會議室。

三、主席：邵主任玉銘 周副主任煦

四、出席人員：

(一)邀請出席人員：(以姓氏筆劃為序)

丁懋慈先生 李登科先生 李雪舫先生 李邁先先生  
李國雄先生 芮和蒸先生 芮正泉先生 呂亞力先生  
周社元先生 金開鑫先生 姜書益先生 趙春山先生  
趙威先生 賴澄民先生 謝復生先生

(二)本中心參加人員：

沈劍虹先生 王建勳先生 朱松柏先生 劉志攻先生  
汪學文先生 趙倩先生 吳中立先生 尹慶耀先生  
蘇起先生 劉發全先生 陶麗麗女士 羅憶珍女士  
李巧石女士 何萍女士 畢英賢先生 洪茂雄先生  
王承宗先生 劉天均先生 楊怡芬女士 蔡昇輝先生  
劉心華女士

五、主席(邵主任玉銘)報告：

各位貴賓，各位先生，各位女士。本中心有四個研究組：國際組、國際共黨組、中國大陸組與經濟組。我個人覺得每一個組每年至少要有一次擴大性的學術研討會。由於中國大陸組、國際組人數較多，研究範圍較廣，所以每組一年至少主辦二次擴大性的學術研討會；至於國際共黨組與經濟組人數編制較少，每組一年至少主辦一次擴大性的學術研討會。今天我們請各位專家、學者、貴賓來和我們一起研究「中共、美、蘇三角關係發展的趨向」，我們也請中心內的和中心外的學者專家提出五個引言報告；

「中共、美、蘇三角關係發展趨向」學術座談會紀要

根據這五個報告，大家再來討論，做成紀錄，在《問題與研究》月刊發表，俾供廣大的讀者羣參考。今天請各位來，目的是希望借重各位的專長和智慧，加強我們中心對這些問題的研究。我對各位在百忙中能抽空來我們這比較偏遠的地方，給我們支持，非常感謝。下面我們請尹先生提出第一個引言報告，即「蘇聯政局之新動向」。

#### 六、引言報告：

尹慶耀先生：蘇聯政局新動向

戈巴契夫新政權登臺，面臨的重大任務有：鞏固權力、刷新人事、整飭紀綱、改革經濟、重振黨的權威、團結社會主義陣營、打破外交僵局等等。

#### (一)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至一九八五年三月，蘇共總書記三人相繼死亡。布里茲涅夫死後兩天；蘇共召開非常中央全會，選舉安德洛波夫繼任；安死後第四天，召開非常全會，選契爾年科繼任；契死後當天召開非常全會，選戈巴契夫繼任。

戈巴契夫於一九八五年三月上臺，四個月後政敵羅曼諾夫引退，葛羅米柯被擁上位高權輕的元首寶座。同年十月蘇共中央全會中，另一元老即政府總理吉洪諾夫因健康理由辭職。戈某對黨中央政治局、書記處可完全控制，對政府官員常指名斥責，黨綱領草案及第十二個五年計劃草案，均退回重擬，在在顯示其權力業經鞏固。戈某於布里茲涅夫時代已嶄露頭角，後又深獲安德洛波夫信任，契爾年科時代已有第二書記之稱，固為其迅速權力鞏固因素之一，然蘇聯權力轉移雖未制度化，但已較前安定而有常規，則毋庸否認。

戈某繼安德洛波夫之後，整肅貪污，加強勞動紀律，撤換不適任幹部。戈某用人，多注重年輕、務實而富有改革精神者。今年三月廿二日將七十五歲的動力和電氣化工業部長聶波羅日尼免職，由五十六歲的馬依諾雷茨繼任，是為第一波。繼之運輸建設部、製鐵工業部、外交部、輕工業部、建築工業部、建築材料工業部、高等和中等專科教育部、建築、道路及公共設施機器製造部、外貿部、石化工業部首長均予更迭。最近更動的是八十歲的總理吉洪諾夫退休，由五十六歲的雷日科夫繼任；七十四歲的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巴依巴科夫免職，由五十六歲的塔里津繼任。總計部長級官員更迭，迄今已達十五件。至於黨幹中如共和國和省黨委第一書記更迭者，已達二十四件。

#### (二)

人事刷新，自以配合戈某改革計劃為着眼點。惟共黨體制僵化，非僅人謀不臧使然，調整人事，效果有限。

十月十五日，蘇共中央全會通過新綱領草案，內容包括以科技為中心的建設計劃、對外政策、社會主義蘇聯的長期目標等基本戰略。

蘇共現行綱領為一九六一年十月黑魯曉夫時代所制定，主要特色為二十年經濟競賽計劃。迄今已廿四年，蘇聯經濟未能趕起美國，差距可能益形拉大。蘇聯當代人更未能如黑魯曉夫所說進入共產主義社會。它早已不合時宜，故亟需修訂。

戈某在全會講話時稱：「新綱領草案是全面完成社會主義的預定表，也是今後向共產主義發展的預定表，要正確地提出來的長期目標，規定黨在組織、社會經濟、思想各方面的活動」。他指出，「規避社會主義，直接到達共產主義是不可能的。把社會主義看成一個獨立發展的階段也是錯誤的。由社會主義轉入共產主義，是由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所決定的。過於性急的嘗試，忽視社會物質的、精神的成長水準而導入共產主義原則，像經驗告訴我們的一樣，那是一條失敗的路」。

蘇聯經濟改革，主要精神在以科學技術革命為基礎提高生產效率，及通過資金和資源的節約而到達集約化。現今蘇聯約七〇〇企業在擴大經濟實驗，戈某稱：「加強企業自主及責任的經濟體系，今年內即可完成」。

戈某在全會中提出到公元二〇〇〇年，蘇聯帶動生產率要增至現今的二·三〇二·五倍，工業生產和國民所得要提高到二倍。要達成前一目標，每年應繼續維持五·七〇六·三%的成長率。後者應每年維持四·七三%成長率。依目前經濟停滯情況言，決非易事。僅依靠局部性改革及加強勞動紀律，恐難達成。

(三)

戈巴契夫長於宣傳作秀，致力塑造個人及蘇聯的和平、易與新形象。如在日本公朝日新聞刊登廣告從事宣傳、對美國公時代週刊記者談話及十月間赴法訪問均然。

戈某已派蘇共中央宣傳部長斯特卡林為駐匈大使，羅馬尼亞因購買蘇聯石油而逐漸溫馴，蘇聯已改善與北韓關係並加強控制中南半島。戈某對團結社會主義陣營及發展蘇聯軍力，似同等重視。

對西方以笑臉從事分化，戈某訪法，謝瓦納滋擬於今年底或明年年初訪日，均屬此一目的。對中共緩和關係，則兼具團結社會主義陣營與分化美、日、中共關係雙重目的。

從限武、裁軍、高峯會議等問題看來，蘇聯立場並無實質改變。亞洲安全體系更是舊事重提。但戈某訪法，並未完全達成預期的目的，中共為爭取西方援助，不會驟然倒向莫斯科。則戈某打破外交僵局，亦非易事。

### 畢英賢先生：中（共）蘇關係正常化進程

今年內，中共與蘇聯的關係，雖然不斷改善，但至今尚無突破。十月四至十八日，它們舉行了關係正常化的第七次磋商。會後，雙方發表的新聞公報說：「兩國間多方面的聯繫和接觸有了擴大，並重申願意進一步改善和發展兩國在政治、經濟、科技、文化和其他領域的關係。」同時，蘇聯參加磋商的首席代表、蘇聯副外交部長伊利切夫在離開北平時表示，「雙方在解決基本分歧方面沒有進展」；另外，中共首席代表錢其琛說，他們「討論了三個障礙」，但沒有獲得結果。

「中共、美、蘇三角關係發展趨向」學術座談會紀要

以下，從中共與蘇聯各方面的接觸與發展，看中（共）蘇關係正常化的進程。

(一)文化交流：文化交流是中（共）蘇關係正常化的開端，至今仍舊是雙方接觸最頻繁的一個領域，毫無疑問，這也是北平與莫斯科之間發展較快速的一個面向。茲舉幾個比較突出的近例：二月中旬，中共南極考察人員訪問蘇聯的南極考察站，賓主相聚甚歡；四月，雙方簽署教育合作議定書，加強學生、教師、研究人員等之交換；蘇聯對外友協訪問大陸，簽訂了「合作計劃」，計劃交換代表團與特別觀光團。此外，中共與蘇聯恢復了電影交流、互派記者。八月下旬，北平電臺開播俄語課程，此一節目已中斷二十年。十月初，蘇方各種代表團多達五個湧進北平，其中較值得注意者有蘇聯作家代表團、劇協代表團及芭蕾舞團；與此同時，中共巨大歌舞團正在莫斯科演出。

(二)經濟合作：近年來，中（共）蘇貿易額仍然不大，但在不斷增長中。例如，去年成交總額約十二億美元，較一九八三年增加百分之六十；今年上半年成交總額約六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五十。今夏，中共「副總理」姚依林訪莫斯科，簽訂了五年貿易協定，五年內雙邊貿易總額將達到一百四十億美元。此外，他與蘇聯方面還簽署一項合作協定，根據協定，莫斯科將協助中共新建七間新工廠，並使另外十七間工廠現代化。去年年底，蘇聯第一副總理阿爾希波夫訪問北平時，已簽署三個文件：「經濟技術合作協定」、「科學技術合作協定」，以及「成立中（共）蘇經濟、貿易、科技合作委員會」的協議。中（共）蘇雙方已同意，明年上半年在北平召開第一次經濟會議。另一方面，近來雙方邊境直接貿易有改善，未見明顯邊界衝突。

(三)政治接觸：隨著文化交流日益頻繁，經濟合作逐漸加強，中（共）蘇之間的政治接觸也有緩緩升高的趨勢。去年十二月下旬，蘇聯第一副總理訪問中共，雙方稱之為進一步改善關係的新起點，今夏中共副總理回訪。今年三月，中共人代會常委張承先率人大代表團訪蘇；十月中旬，蘇聯回訪，提高層次，由聯盟院主席托爾庫諾夫帶頭。中共投桃報李，由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彭真及「國家主席」李先念會見。雙方「國會」的交往，顯示政治關係的改善。九月底，雙方外長在聯合國會晤，共同表示，今後將在各方面擴大接觸；並同意，雙方外長將在適當時期互訪。

(四)三障礙與三建議：最近，蘇聯再度提出三個建議，以使雙方政治關係獲得重大進展。這三個建議是：(1)締結不使用武力和互不侵犯條約；(2)簽署一項關於兩國關係原則的文件；(3)在國境地帶採取一些加強信賴的措施。但是，由於蘇聯在「三個障礙」（蘇聯在中蘇邊境的重兵、支持越南侵佔高棉、軍事佔領阿富汗）上不肯讓步，中共也拒絕考慮蘇聯的「三個建議」。中共進一步表示，三障礙仍在，兩黨關係難言恢復。

中共與蘇聯忙於權力換代，致力經濟改革，故皆想改善相互關係，維持和平環境。但由於基本歧見一時難以折衷，雙方關係正常化仍沿著雙軌發展。易言之，在次要問題上有較大進展，而在主要問題上難以突破。

蘇起先生：和而不懈的美蘇關係



即將於十一月十九日召開的美蘇高峯會議是兩大超強六年來第一次舉行的高峯會議。由於美蘇關係影響整個世局，其重要性，自不待言。個人擬就當前美蘇關係發展的動力、雙方談判的實力、高峯會議的主題與雙方立場，以及會議可能的結果，試作分析。請諸位先進不吝賜教。

### 一、和解的動力——蘇聯「需要」(Need) 和解，美國「想要」(Want) 和解

這次會議代表兩國近年來和解努力的最高點。對雷根與戈巴契夫個人來說，都是「大姑娘上轎——第一回」。因此自然在背後有強烈的動力。

在美國方面：1. 雷根政府受到來自國內與歐洲的強大壓力。若不稍作退讓，雷根的國防建設及盟邦關係都將大受影響。

2. 美國希望能減輕蘇聯核子武器的威脅。

3. 雷根本人或有「留名青史」的動機。

在蘇聯方面：1. 蘇聯的經濟與社會情況日壞，亟需一段喘息的時間，來作調整。(戈氏接受《時代》周刊訪問時，對此直言無諱)。

2. 蘇聯希望能壓制美國核子武器的發展，尤其要阻止美國挾其科技優勢在戰略防衛方面突破。

3. 戈巴契夫可藉此改變蘇聯近年來的「惡人」形象(如退出談判、擊落民航機、暗殺教皇等)，重建美蘇「平起平坐」的地位，並提升他個人在國內外的政治聲望。

總的說，蘇聯較需要和解，而美國比較可以容忍和解失敗的代價。

### 二、雙方的實力——美國大於蘇聯

雖然目前戈巴契夫的宣傳攻勢頻頻先馳得點，但雷根在日內瓦仍然大可沉着應戰。因為：

1. 大的趨勢(指經濟、科技與雙方在第三世界的競賽)有利於美國。

2. 蘇聯對雷根「戰略防衛計劃」在戰略關係與科技競賽上的長期影響(而不是短期影響)極為憂慮。

3. 在短期內，蘇聯比較憂慮美國發展「陸基反飛彈系統」(這系統完全合乎「反飛彈條約」)。

4. 美國與盟邦的關係穩定而良好。近月來法國、義大利、埃及等國與美國的爭吵均是雷大雨小。

5. 雷根個人在國內的政治聲望空前的高。

不過，蘇聯也有相當實力。因為：

1. 蘇聯的「第一擊」的戰略核子武力始終令美國寢食不安。

2. 蘇聯分化北約組織國家及利用美國內部和解勢力的能力不容輕忽。戈巴契夫似乎更懂得施展這個能力。

3. 蘇聯在第三世界（如中東、中美洲及非洲南部）的影響力雖不如過去，但仍然敗事有餘。但綜合而論，美國實力較大，籌碼較多。

### 三、會議主題與雙方立場——「漫天喊價，就地還錢」

此次高峯會議的可能主題有四。由於蘇聯的堅持，「核武管制」必是主戰場。為了牽制蘇聯的火力，美國必想另闢「區域問題」及「人權」兩戰場。此外，「貿易與文化交流」將是雙方折衝的潤滑劑。

在「核武管制」問題上，蘇聯必集中火力在所謂的「星際戰爭」上。到目前為止，蘇聯已提出「只可研究，不准其他」及「雙方各減百分之五十攻勢武器」等乍看公平的提議。美國則提議「攻防兩種武器必須同時限制，互作交換」及「可研究及試驗戰略防衛武器，只在部署前通知對方」。顯然兩國立場相差太遠。

在「區域問題」及「人權問題」上，雷根必然本諸信念，就蘇聯「擴張主義」及「罔顧人權」兩點大為發揮。戈氏也必然悍然否認，並反咬美國一口。

「貿易與文化交流」互惠程度高，對政治關係影響小，因此最容易達成協議。

總之，現在美蘇雙方都只在「漫天喊價」。真正結果還要看屆時的「就地還錢」。

四、可能的結果——異中求同，難者存異

因為雷根與戈巴契夫都不敢自日內瓦空手而回，所以最起碼會在「貿易與文化交流」上製造出可供雙方簽名照相的文件。在這個範圍內，雙方可能同意擴大貿易（如穀物）、增設領事館、恢復文化交流、維護民航機的安全。

蘇聯在人權問題上示弱的可能性不大。

有關「區域問題」，美國可能邀請蘇聯重新但非正式地加入中東談判過程（事實上，以色列已在努力），但要求蘇聯在中美洲及非洲南部鬆手。蘇聯想重返中東。但不肯真的在其他地方鬆手。所以不易談成。為保留面子，雙方或許會協議成立「危機防止中心」之類的正式溝通管道。或者，若歧見更深，只同意增加官員互訪。

在核武管制的問題上，雙方亦可能做廣泛的、一般性的承諾。如：

1. 「攻防兩種武器同時限制，互作交換」（即蘇聯不再堅持以美國放棄戰略防衛計劃為「先決條件」）。
  2. 「雙方各減百分之五十（或別種比例）的戰略及中程飛彈」（即蘇聯在歐洲的中程飛彈也將計算在內）。
- 以目前發展來看，即使這些承諾也不易達成。

### 五、結論——和而不解

雖然這次高峯會議是美蘇關係新的里程碑，可以緩和兩國間的緊張氣氛，但重大的問題仍將無解。未來仍是以競爭為主導的

局面。

王承宗先生：中共對美關係的前景

(一) 中共對美關係基本立場：(1) 以和平共處五原則為基礎同美國發展友好合作關係。(2) 反對美國「臺灣關係法」、對臺售武和把臺灣作為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看待；聲稱這是侵犯中國主權、干涉中國內政的行為。(3) 反對美蘇霸權主義政策，中共自稱，其對外關係不是等距離外交，「既不站在這邊反對另一邊，也不是站在那一邊來反對這一邊。……我們反對他們所奉行的具體政策……。」

(二) 中共對美關係問題：(1) 一大障礙——臺灣問題。(2) 三大問題：貿易問題（外貿赤字、紡織品限制、出口信貸）、科技轉移放寬問題、軍事合作問題。(3) 其他問題，例如航空協定、海運協定等具期限性談判爭執。

(三) 中共對美外交政策的認知：中共學者認為雷根政府外交政策最大特點是以兩極思想為指導，以爭奪軍事優勢為中心，力圖從實力地位出發，遏制蘇聯擴張，加強美國在全球的霸權地位。雷根政府對外政策特點是：意識形態色彩較濃，加強武力威脅，對第三世界國家恩威並用，經濟政策上的霸權主義突出，在國際組織和國際會議上經常達抗絕大多數國家的意志和利益。

#### (四) 中共對美關係前景：

(1) 臺灣問題：中共對美交涉仍將繼續提出該問題，惟已成為公式化舉動，中共勢難取得美國廢除臺灣關係法的承諾，以及協助北平對臺施加壓力，促其進行和談。

(2) 經貿問題：由於雙方貿易體制不同，中共擴展對美輸出需賴美方進口商主動採購，中共外貿公司缺乏主動性和在美推銷尋求買主的能力，對美逆差仍將存在。美方在中國大陸投資偏向於資源開發與具短期獲利回收性行業為主，投資仍將繼續增長；但對中共而言，利用投資合作爭取科技轉移的比重則較低，因美商所能提供的科技多屬於普通製造業生產技術。美國政府放寬紡織品入口限制可能性甚小，因為此非單純對中共的設限。

(3) 科技轉移問題：雖然美方逐漸放寬對中共科技輸出，就美國而言，給予的科技水平和層次較低，同時亦需考慮來自其他國家，特別是東歐地區可能提供科技轉移，美國自然需搶先給予。至於高度技術轉移，美國仍將以國家安全 and 「對共產地區輸出管制委員會」(COCOM) 管制為理由，把關不放。

(4) 軍事合作：1. 政治上，美方強調雙方軍事機構與人員互訪，及軍艦訪問，欲圖影響中共軍方對美印象及使蘇聯猜忌中共。北平則同意此種訪問，但欲降低其聲調和避免成為美宣傳利用品，以及蘇方的疑慮。2. 軍事訓練和科技轉移，美方將提供此類的援助和方便；但在科技給予仍是有限度、低水平；儘管中共希望取得仿製技術以代替大量採購武器、軍需品，美方基於本身利益考慮不易售予軍事生產技術。即使是合作生產，仍以裝配作業為主。

中共對美關係前景，基本上會有進展，不過發展速度有限。過去中共以臺灣問題為藉口，阻止雙方關係走向區域戰略合作，並盡力爭取美方經貿讓步和科技轉移。對美國來說，經貿讓步和科技轉移雖可考慮，惟中共應提供政治利益作為回報；然而中共不但不再重彈七〇年代所言反蘇聯合陣線和平行、共同的戰略利益；反而在國際舞臺上處處與美國唱反調，聲援第三世界。無形中，中共在國際問題同意美國政策者少，反對者多。美國基於這種情況，必須衡量和斟酌中共的居心，亞洲鄰近盟邦的反應，從而對中共採取更為謹慎的態度。在未來，中共對美工作重點將繼續不忘提出「臺灣問題」，藉以困擾及混淆美國朝野視聽；同時積極爭取經貿讓步與進一步科技轉移。須注意的是，當中共和蘇聯更接近一些，美方可能會對中共讓步一些，以圖平衡蘇聯、中共緩和的壓力或影響力。

趙春山先生：世局變化對我國可能的影響

從一九五〇年代初期到目前為止，美國、蘇聯和中共三角關係的發展，曾歷經幾個階段的演變，每一階段皆對我國的利益造成不同程度的影響。

第一個階段大致從五〇年代初期到五〇年代末期。這段期間的三角關係，其特色是蘇聯中共和聯合反美，也就是所謂兩極政治的型態。意識形態是同盟體系的主要凝聚力。中華民國此時屬於美國領導下自由世界的一員。我們的利益和美國對共黨採取的圍堵政策相互依存。

第二個階段大致從六〇年代初期到六〇年代末期。中共和蘇聯彼此交惡，美蘇繼續維持對抗，中共此時不但反蘇，同時也反對美國。由於中共、蘇聯在不同程度上處於兩面受敵的狀態，我們的外交處境最為有利。

第三個階段大致從七〇年代初期到蘇聯入侵阿富汗以前這段期間。中共和蘇聯仍維持敵對狀態，但美國却同時對蘇聯和中共採取和解的政策。由於美國開始和中共關係正常化的過程，三角關係進入對我國不利的發展。

第四個階段大致從阿富汗事件之後一直到目前這段期間。中共和美國維持良好關係，但美蘇的和解已告破滅，而中共和蘇聯却出現解凍的跡象。我國的處境較前一階段更為不利。

展望未來的三角關係，影響到我們國家利益的變項是美蘇關係的演變，以及美國對中共和蘇聯改善關係的認知程度。下列三種情況值得注意：

第一種情況是美蘇繼續維持冷戰對立，但對中共和蘇聯關係的改善則持疑慮和不耐態度。如果美國的反應是接近五〇年代對共黨的圍堵政策，則在某種程度上會恢復傳統的兩極政治狀態。這將是對我最為有利的情況，但可能性極小。

第二種情況是美蘇繼續維持冷戰對立，但美國不認為中共和蘇聯關係的改善會有大幅進展，故仍將持續「聯中制蘇聯」的戰略，甚至加速和中共的合作步調。這種情況對我國極為不利。為了討好中共，美國可能會以我國的利益為犧牲，迫使我國接受

中共的統戰安排。

第三種情況是美蘇改善關係，甚至恢復到七〇年代的和解狀態。與此同時，美國雖對中共和蘇聯關係的改善心存疑慮和不满，但也不會有過度反應。美國可能對中共和蘇聯採等距離的立場。這種情況對我比較有利，因為美國不會對中共的要求屈服，也沒有必要採「聯中制蘇聯」戰略。

第四種情況是美蘇改善關係，美國也不認為中共和蘇聯關係的改善會有大幅進展。但美國基於和蘇聯和解的必要，不會以加速和中共的合作（特別是軍事合作）來刺激蘇聯。這種情況對我尚稱有利。

在此必須強調的是，上述三角關係的描述，並沒有將各個角色內政發展的因素考慮在內。實際上，這些內政因素是相當重要的。有關未來三角關係的演變狀況，我們對於美蘇關係的影響力有限，但對於美國對中共和蘇聯改善關係的認知方面，我們仍然可以適時表達我們的看法，以減少中共在三角關係的活動餘地，以及避免中共將所謂的臺灣問題，作為它對美國討價還價的籌碼。基此目的，我們未來的對應之道為：

1. 針對美國資本主義社會和共黨社會存在的矛盾，我們仍應強調反共立場，堅守民主陣容，除此別無選擇。
2. 對於美蘇之間的高層談判，如果有助於世界和平，我們應抱樂觀其成的態度。
3. 強調中共外交政策的多變和不可依賴，減低美國對中共的幻想，特別突出中共和蘇共之間利害一致的所在。
4. 提醒美國軍援中共可能造成的不利影響，包括蘇聯、日本，乃至東南亞國家的反應。此舉將改變地區權力平衡，有促使情勢複雜化和不穩定的危險性。

#### 七、自由發言：

邵玉銘先生：

聽過五位專家學者精彩的引言報告，我想提出一些淺見，並希望大家提供寶貴意見。

我個人總覺得美蘇關係一直影響到中華民國與美國、以及美國跟中共之間的相互關係。就拿三件事來講，我覺得都是美蘇關係變化的一個產物。

第一件事即一九七二年的「上海公報」。我個人認為，這純粹是美國和蘇聯在越南衝突下的產物。美國想從越南撤兵，希望得到中共的一些幫助；美國領袖因此訪問北平，對中共作出讓步，簽訂了「上海公報」；希望中共對美國從越南撤軍作出一些直接或間接的幫助。雖然美國並未達其主觀的願望，但這是「上海公報」簽訂最大的原因。

第二件事是一九七九年美國與中共建交。我認為這也是美蘇在國際競爭下另一個間接或直接的產物。在這一事件發生以前，卡特因受到布里辛斯基與一些美國反蘇人士的影響，亦在美蘇關係日趨緊張以及在中東問題等等的衝擊下，為了在外交上有所突

破，為了對蘇聯產生更大的壓力，乃決定與中共建交。

第三件事即對我們傷害最大的一九八二年「上海公報」。這也是雷根總統上任以後，美國保守派份子極力甚至瘋狂反蘇情緒的產物。

所以我認為美蘇關係要是穩定或比較健康的話，美國不論是在主觀或客觀上都沒有一定要聯中共的理由；那麼中華民國所受的傷害就會比較小。假如美蘇關係再惡化，美國在主觀的意識或客觀的需要上就覺得必須聯合中共來抵制或壓迫蘇聯，中華民國所受的傷害就比較大。所以我認為美蘇關係的變動，影響到我國與美國之間的關係。

今天很多人說，中共是在玩三張牌：玩「臺灣牌」（即：臺灣問題是中共對美關係的主要障礙）來勒索美國；玩「美國牌」來壓迫蘇聯；玩「蘇聯牌」來向美國敲榨。美國也是一樣：玩「臺灣牌」來掌握中共。因為中共想「解放臺灣」，必須與美虛與委蛇，所以美國能掌握臺灣這張牌，就可以維持或加強其與中共的關係。美國也玩「中共牌」來壓迫蘇聯，玩「蘇聯牌」來壓迫中共。蘇聯也是一樣：藉美蘇關係的改善來壓迫中共；有時也以「臺灣問題」來挑撥美國與中共的關係，指稱美國執行兩個中國政策，美國和臺灣依然「勾結」，根本對中共沒有誠意。另外，蘇聯藉著與中共關係的改善來對美施加壓力。所以中共、美國、蘇聯都互利用不同的角色來向對方榨取最高的利益。

最後，我認為中華民國並不是任人宰割，並非沒有迴旋餘地。相反地，我認為迴旋餘地非常之大。比如說，我們對中共之影響，就不容忽視。我個人認為我們是對中共這幾年來對內改革與對外開放的最大壓力，也是最有效的一個督促。這也是美國多年來一直追求想改造中共的一個目標。所以，中華民國的存在與繁榮既可以改變中共，又符合美國國家利益。這一點也是我們國家對中美關係的一個資本。雷根總統在聯合國也特別指出，中華民國、新加坡、韓國的進步是開發中國家的一個模式。這次新加坡李光耀先生在美國國會演講，其中有一點我非常贊同。他說，假如美國過份強調保護主義，而傷害到新加坡等等發展中國家的話，就會使第三世界國家失去一個效法以美國模式為基礎的發展經驗。就長遠觀點來說，這對美國及自由世界皆不利。這一點也是我們跟美國關係的大資產。因為，對美國人而言，臺灣成功的故事，等於美國成功的故事。維持臺灣的繁榮與安全令美國也感到光榮。以上這些點也是我們可與美國一再強調的，並可得到美國對我們的繼續支援。

至於蘇聯問題，我認為，我們也有發生重大作用的地方。如今，蘇聯在西太平洋的軍力不斷的加強，各種活動也日趨頻繁；而中華民國居於臺灣海峽和巴士海峽的地理要衝，在遏阻蘇聯在西太平洋之擴張上，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所以不論對中共，對美國，或對蘇聯之擴張，我們都扮演了很有意義的角色。在中共、美國、蘇聯三角關係之下，我們所可運用的迴旋之地實在是非常之大。至於如何運用以發揮重大作用，則完全要靠我們自己的智慧與努力。我以這些簡單的話，一方面代表中心來歡迎各位，另一方面也在各位面前表示一些淺見。研討會的第二個部份，請周副主任代我主持，謝謝各位。

丁懋慈先生：

很感謝蘇起教授對美蘇關係作精闢的分析。關於美蘇首腦高峯會的動力問題，我準備略作補充。由於兩個超強所儲備的核子武器，足以毀滅地球五十次而有餘。因此，限制核武以減輕世人對核戰的恐怖心理，便成為美蘇高峯會議優先討論的主題。一九八五年諾貝爾和平獎，頒給醫學界反核協會，便是一個好例子。

至於美與中共關係，多年以來，白宮認為美國的利益，繫於：(一)美蘇戰略武器平衡；(二)中(共)美蘇三角關係；(三)美與中共關係成為準同盟；(四)就所謂臺灣問題言，中共認為是內政問題，美國却認為是國際問題。

美國認為，若中蘇共擴大衝突，可能對全球或區域，引起難以預料的不良後果。美國的最大利益在於維持一個能自力自主的中共政權。最近美與其盟國放鬆對共產國家高級科技管制，中共獨得其利。又中共在核能技術上，協助巴西、阿根廷、伊朗、南非與巴基斯坦，但美國政府部門却對國會閉口不提，可見美國甚至要提高中共的核武平衡。

再就上述的「準同盟」而言，美國以為，美中(共)軍事聯繫，對北平的「實務政策」有鼓勵作用，也可以嚇阻蘇聯，且可以牽制蘇聯在西歐的兵力，藉以減輕華府負擔。

至於所謂臺灣問題，中共一再提出，無非是藉此對美進行敲詐。猶憶一九七五年，福特總統訪平，曾在會談中解釋美國與中華民國的關係，周恩來却不專心與談，而祇是斤斤於美蘇「和解」，並力言莫斯科之狡詐，不可信任。由此可知北平之走美國路線，係因受蘇威脅，而非繫於對美外交。臺灣關係法中明言，倘以武力(包括禁運及杯葛)侵犯臺灣的安全，將被視為對西太平洋地區和平及安全的威脅，而為美國所嚴重關切。因此，售與中華民國自衛武器，乃是美國的既定政策。

金開鑫先生：

這次學術座談會的主題涉及所謂「美國、蘇聯與中共」三角關係，在美蘇即將舉行高峯會談之前不久舉行，深具意義；因為這個三角關係的任何變化，對我們都有或多或少、或好或壞的影響，確實是不容忽視的。

剛剛聽到幾位先進的引言報告，對於背景有清晰的說明，對現狀與展望也有仔細的分析，受益良多，個人對於他們既欽佩又感謝。

誠如趙春山先生所指出的，在「美、蘇、中共」這個三角關係上，我國的影響力是有限的，根據過去十多年的經驗，它的變化往往對我國害多於利。當然我們研究國際政治的學者確實要多加注意，詳細剖析，以便將研究結果提供給政府作因應的參考。個人認為：在「美、蘇、中共」三角關係的變化中，我們確實難以直接地發揮影響力，但是這並不表示我們就當被動地逆來順受。我們知道，目前世界權力結構上除了這個主要的三角關係外，還可以劃出許多三角關係，而這些三角關係對於美國、蘇聯與中共具有相當的影響力，我國對這些三角關係可以發揮的影響就要大得多了。換言之，我們可以利用對其他三角關係的影響力，間



接影響世界權力結構中的這個主要三角關係，增加我國在國際政治中的影響力，保障我們的國家利益。試舉二例簡要說明：

(一)在美國、日本與東南亞的三角關係中，美日的經濟競爭是相當劇烈的，由於時空因素及成本關係，美國往往居於劣勢。假如我們能吸引美國廠商以臺灣為美國貨品進軍東南亞的基地，利用臺灣與東南亞間的時空優勢、我國高水準的技術能力、我們與華僑的親密關係，我相信經過我們的服務，美國貨品在東南亞的競爭能力必有大幅改善，因之在美國經濟戰略上，我國的份量就必會加重。

(二)在美國蘇聯與中南美洲的三角關係上，蘇聯與古巴在中南美的侵略活動，給美國帶來極大的困擾，美國似乎挨打居多，還手的機會少。中南美洲國家的問題主要的是發展的問題，而我國却是開發中國家中最具成功開發經驗的國家，假如我們能將我國開發經驗，成功地移植到中南美洲國家，必能使美國在戰略上不能忽視我們。

以上淺見，不夠成熟，貢獻出來，拋磚引玉，敬請各位先進多多指教。

芮正臬先生：

關於中共對蘇聯關係正常化問題，管見認為非目前之事。謹就歷史觀點及最近發展論析，就教於各位專家。中共與蘇交惡由來已久。中（共）蘇「蜜月」期間所訂「科學技術協定」，蘇聯拒不履行義務。蘇多年來渴望在中國有一海軍基地，中共拒絕。韓戰後蘇聯向中共攤索軍費美金六億元，尤使中共懷恨在心。毛共發動八·一三金門砲戰，蘇聯却未依照同盟條約出兵支援，大出毛共意外。美、蘇訂大衛營協定，以及美、英、蘇禁止空中核試條約，置毛共於事外，更為後者所痛恨。毛共遂於一九六九年發動珍寶島事件，展開全面反蘇運動。蘇聯經多方面審慎考慮後，認為不能與中共作戰。於是，一面叫嚷與中共改善關係，一面增兵邊境（連外蒙六十師），廣設機場（七十個），部署SS二十中程飛彈（在亞洲者為其全數三分之一）；另則與印度修好，啖使越南攻佔高棉，出兵佔領阿富汗，並叫嚷成立「亞洲安全體系」旨在包圍中共。中共則拉攏巴基斯坦（以制印），與美建交（以制蘇），積極爭取日本，使在太平洋地區形成美、中（共）、日聯盟態勢，與蘇成立對峙狀態。對蘇要求改善關係，中共則提出三條件：(1)越軍退出高棉，(2)蘇軍退出阿富汗，(3)蘇在中共邊境軍事部署須恢復至一九六〇年前狀態。蘇聯則答以，越退出高棉蘇聯不能干涉內政，蘇在阿富汗駐軍係徇阿國之請。至邊境軍事部署問題尚可考慮商談。顯見毫無誠意，且雙方立場懸殊，事實上亦不可能立即有所進展。但中、蘇表面上均裝模作樣，擺上願意促使彼此關係正常化姿態。雙方貿易額也確有增加。並已舉行第七次次長級關係正常化會談。但這些都是在中共及美蘇三角關係中，基於彼此互相牽制影響的運作原理，所玩「打牌」的手法而已。是以，中共與蘇聯大幅度改善關係，在上述越南不撤出高棉、蘇聯不撤出阿富汗的大前提下，恐一時難有進展；表面上的談談等做法，僅是「打牌」把戲。以上淺見謹請指教。

李登科先生：

由於大家都很客氣，因此我想趁這個空檔就中共與美國的科技轉移問題，提出一些補充意見。

剛才王承宗先生在引言報告中曾指出，美國不會把高級精密的科技轉移給中共。王先生也說，經由與美國的科技合作，中共建立了一些工廠，但這些工廠其實只是將來自美國的零件予以裝配而已。對於這兩點，我有一些稍為不同的意見：

第一、就科技轉移而言，美國並不輕易將高級精密的科技轉移給其他國家，包括美國的盟邦在內。值得我們特別注意的是，美國對中共的科技轉移似乎愈來愈放鬆。今年十月十六日，美國副總統布希在訪問中國大陸時更宣佈說，美國將進一步放寬對中共的科技輸出，包括二十多種高級科技項目。

第二，根據個人所獲得的資料，自從一九八二年以來，美國對中共的科技轉移已呈大幅度成長。一九八二年，中共對美國提出要求購買二千三百五十件的雙重用途科技項目，美國同意出售其中的二千零二十件；一九八三年，中共要求購買四千二百九十五件，美國答應三千三百一十四件；一九八四年，中共要求購買八千八百六十九件，美國答應四千零九十七件。以金額來說，一九八二年中共從美國購買的科技產品達美金三億五千萬美元，一九八三年達十億美元，一九八四年前十個月更升至二十八億元。從這些數字來看，中共對美國科技產品的胃口確是愈來愈大，而中共的要求則是道地的得寸進尺。

第三、中共經由與美國科技合作所建立的工廠並不全是「裝配」廠而已。譬如說，美國最近決定將一個砲彈廠賣給中共，該工廠將讓中共有能力製造一五五毫米及其它口徑大砲的砲彈。換言之，該兵工廠並非一個裝配廠。

以上三點是我對中共與美國科技轉移的一些補充意見。最後，我願特別提出另外一點，就是美國對中共的科技轉移比較不會引起我國及其它亞太自由國家的關切，因為「雙重用途」的科技產品畢竟與武器有所不同。問題是，中共在獲得大量的美國現代化科技之後，不但可以提升其工業水準，也可以間接地強化其國防科技。中共在工業技術上的提升無疑地將對我外銷的工業產品產生威脅，而其國防科技的強化則又將增加對我安全上的威脅。因此，我們的確應該密切注意美國對中共的科技轉移並研擬因應之道。

趙威先生：

我有兩個問題想提出來請教諸位。

(一) 戈巴契夫是否真握實權？戈巴契夫上臺後，雖大力提拔六十歲以下之青壯幹部，但最近一期《外交季刊》美國赫夫教授 (Jerry Hough) 指出，上述新幹部如李加察夫 (E. Ligachev)、內日可夫 (N. Ryzhkov)、契布瑞可夫 (V. Chebrikov) 等均屬布魯斯時代老人基里林科 (Kirilenko) 之黨羽，即所謂「實務派人士」。似乎戈首之實力尚未達到如一九三〇年代末期史達林、或一九五七年後之赫魯雪夫能獨當一面、大權在握的地位。

(二) 美國目前之赤字問題，似乎亦直接影響美、蘇關係。美國在和緩的國際環境下，似乎可減低軍事支出，間接減低赤字問題

之壓力。

周祉元先生：

(一) 蘇共領導階層近十年來迭有變更，在契爾年科死亡後，政治局委員減為十人。戈巴契夫上臺之後，極力排除異己，先後於今年四月二十三日、七月一日及十月十五日罷黜了羅曼諾夫 (Grigory V. Romanov)，狄洪諾夫 (Nikolai A. Tikhonov)，並將葛羅米柯 (Andrei A. Gromyko) 架空，使其出任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 (蘇聯國家元首)，居於「高拱無為」的地位，恢復了布里茲涅夫未擔任此一職位前的型態。

(二) 戈首於進行整肅的同時，並提升了李加契夫 (Yegor K. Ligachev)，雷日科夫 (Nikalai I. Ryskov)，謝瓦納茲 (Eduard A. Shevardnadze)，切布里科夫 (Viktor M. Chebrikov) 四人為政治局委員。以謝瓦納茲取代葛羅米柯出任外長，雷日科夫接替狄洪諾夫擔任總理。使政治局委員的人數達到目前的十二人。

(三) 在政治局候補委員方面，謝瓦納茲、切布里科夫竄升政治局委員後，提升國防部長索科洛夫 (Sergei I. Sokolov) 及新任第一副總理兼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塔里臻 (Nikalai V. Talyzin) 兩人為政治候補委員，連同原有狄米契夫 (Petr N. Demichev)，多爾吉赫 (Vladimir I. Dolgikh)，庫茲涅佐夫 (Vasilii V. Yuznetsov)，波諾馬廖夫 (Boris N. Ponomarev)，目前計為六人。

(四) 書記處的變動較大，除總書記戈巴契夫外，其餘的九名書記是：李加契夫 (政治局委員兼)，波諾馬廖夫，多爾吉赫 (政治局候補委員兼)，卡比托諾夫 (Ivan V. Kaptonov)，魯沙科夫 (Konstantin V. Rusakov)，齊緬寧 (Mikhail V. Zimianin)，尼康諾夫 (Viktor P. Nikonov)，柴科夫 (Lev N. Zaikov)，葉爾欽 (Boris N. Yeltsin) (以上為專任)。

(五) 在契爾年科死亡時，政治局委員的平均年齡為六十七歲，目前降為六十四歲。但七十歲以上者，尚有葛羅米柯 (七十五歲)，索羅敏澤夫 (Mikhail S. Solomentsev，七十一歲，蘇共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庫納耶夫 (Demmukhamed A. Kunayev，七十三歲，哈薩克共黨中央第一書記)，格里辛 (Viktor V. Grishin，七十歲，莫斯科市黨委會第一書記)，四人政治局候補委員超過七十歲者，尚有庫茲涅佐夫 (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第一副主席，八十四歲)，波諾馬廖夫 (蘇共中央國際部實際負責人，八十歲)，索科洛夫 (蘇聯國防部長，元帥，七十三歲) 三人。書記處專任書記超過七十歲者，尚有卡比托諾夫 (七十歲)、魯沙科夫 (七十六歲)、齊緬寧 (七十一歲) 三人。

(六) 從以上的資料可以看出，戈首掌權後在領導階層所提拔的新人，除國防部長索科洛夫外，其餘年齡都在六十四歲以下，今後蘇共走向年輕化的趨勢已很顯然。不過就目前言，仍有將近一半老邁官僚留在領導階層，足證戈首權力地位尚不能算完全鞏固，也尚難得心應手。其次是烏斯丁諾夫死後，其繼任人索科洛夫現只是一名政治局候補委員，有發言權，無表決權，說明在蘇共

權力核心中，軍方勢力已被削弱。推測在明年二月召開的蘇共「二十七次」，將會出現一場激烈權力鬭爭，如果戈勝，包括中央委員在內的大批領導幹部將會遭到整肅的命運。

洪茂雄先生：

在吾人討論美、蘇和中共的三角關係之時，還有一個角色不容忽視，那就是歐洲。換言之，歐洲在美、蘇、中共三角關係中，也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足以影響其關係的發展。

最引人注目的是，美、蘇二國首腦高峯會議，雙方都在亮「歐洲牌」，以壯聲勢。首先，蘇共總書記戈巴契夫十月四日訪問法國，這是他上臺半年以來，第一次訪問的西方國家。戈某藉巴黎之行的機會，大放厥詞，要與英國、法國單獨談判歐洲部署核武問題。同時，莫斯科向華府提出裁減核武的新建議，各自將足以發射對方領土的核武飛彈裁減五成。繼之，戈某又領導華約各國領袖於十月二十二日在保加利亞首府索非亞舉行華約高峯會議，重申與西方談判的立場。莫斯科這二項舉動無疑的已在東西歐展開了宣傳戰，隨後，美國雷根總統亦不含糊，利用聯合國慶祝成立四十週年，各國領袖雲集紐約之便，於十月二十四日舉行西方六國首腦會議（美、日、加、英、意、西德），期使西方陣營步調一致，表現團結的新氣象；接著，北約的國防部長會議十月底於比京布魯塞爾召開，再重申西方對核武談判的態度。由此以觀，美蘇雙方都在刻意的打「歐洲牌」。

中共看到這場牌局，不甘寂寞，也企圖插上一脚，上月底，東西德二名政府高級官員幾乎同時訪問中國大陸。中共「總書記」胡耀邦接見東德部長會議副主席克萊伯，而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主席」鄧小平則接見西德副總理兼外長根舍。胡鄧二人不約而同地談起中共與歐洲的關係。根據鄧小平和胡耀邦的談話，予人清晰的感覺，中共也想起「歐洲牌」來。中共擺出「歐洲牌」的架式如下：

第一、試圖削弱美蘇的力量：中共深知其對美蘇的影響力有限，窺知「東西歐都不願意被綁在美蘇軍備競賽的戰車上」，乃迎合歐洲人的心理，鼓勵東西歐加強緊密的關係，實現歐洲統一，以削弱美蘇二霸的勢力。鄧小平說，這是中共長遠的目標，並聲稱，中共將在能力所及的範圍內，促使歐洲成為一個集團，另一個勢力中心。

第二、支持歐洲聯合行動：最近中共領導階層的言論，相當強烈的支持與讚揚法國所提出「犬里卡」(Eureka) 太空科技研究計劃，同時對美蘇二國在歐洲部署核武飛彈，以及擴大軍備競賽，予以譴責，同情歐洲人的反核情緒。鄧某表示，東西歐之間의 共同利益，遠超過意識形態的分歧。

第三、加強與東西歐的關係：從今年的種種跡象顯示，中共已展開一系列的外交活動，一方面與波蘭、東德、匈牙利等東歐國家簽訂五年的長期經貿合作協定，以改善凍結二十多年的關係；另一方面擴大與西歐各國政府的接觸，簽署多項合作協定（核能、經貿、科技等）。按照鄧小平的說法，與歐洲的合作，可引進中共四個現代化建設所迫切需要的投資與技術。

中共之所以急著要亮出「歐洲牌」，其背景昭然若揭：其一、利用「歐洲意識」的抬頭：八十年代以來，美蘇核武談判陷入僵局，使得東西歐體認到危機意識，認為「東西方的關係不能單純地取決於飛彈之爭，亦不能由華府和莫斯科單純地決定東西方的關係」。歐洲有潛在的力量，可以發揮積極作用；其二、與美蘇保持距離，既可左右逢源，亦可減少雙方的猜忌；其三、中共與歐洲沒有利害衝突，與歐洲加強合作，符合雙邊的戰略利益。的確，中共實行「開放政策」之後；與歐洲的關係已有相當程度的進展，一九八三年應邀參與「歐洲政治合作」(EPC，屬於歐洲共同體)，這幾年來與歐洲的貿易關係亦有所增長。

不過，明眼人看來，中共玩「歐洲牌」，未免一廂情願，自以為可從美蘇之間的鬭爭得到一點好處。事實上，美蘇在歐洲的勢力，根深蒂固，壁壘分明，「歐洲牌」畢竟不是中共所想像的那麼單純，可以隨心所欲的出擊。

賴澄民先生：

(一)蘇聯對外基本政策本質未變：一方面分化西歐與美國之間的關係；另一方面強化蘇聯與東歐集團國家的關係。

首先，就分化西方陣營的意圖來看，蘇聯記取一九八三年在歐洲部署美製中程飛彈事件上受到外交挫敗之教訓後，即加強與西歐國家接觸。從一九八四~八五年西歐主要國家法、英、西德、義大利、西班牙等國元首或在野黨魁均曾先後至蘇聯訪問。在此期間內，蘇聯領袖至西歐訪問，則只有戈巴契夫的巴黎之行。因此我們可以稱戈首此行是近兩年來蘇聯歐洲政策執行以來首度正式出擊。就蘇聯對歐關係來說，實具重大意義。

蘇聯一改以往威脅之姿態，不斷展開其所謂的和平攻勢。為了表示其愛好和平，戈首再度提及美蘇限武談判的新建議，其內容要點包括：

(1)美蘇共同裁減百分之五十可以射到對方境內之「戰略性武器」；另外蘇聯並建議將雙方核子彈頭限制在六千個以內；任何一種形式之武器不得攜帶超過所擁有核子飛彈的百分之六十。

(2)在談判開始後，雙方不得發展新型武器；禁止部署長程巡弋飛彈；禁止境外部署新式核彈與限制已部署在外國飛彈的現代化。

(3)美國停止發展「星戰計劃」，包括禁止科學研究、試驗及發展。

(4)蘇聯裁減瞄準歐洲之SS-20中程飛彈，並願分別與英、法舉行裁減武器談判。

綜觀蘇聯所提限武建議，的確相當動人，惟從其限武政策本質觀之，蘇聯並未改變其當初談判之基本政策，要求美國停止發展星戰計劃與裁減包括英、法在內之中程核武。

至於與東歐集團國家關係，戈首為了加強彼此團結一致之形象，於十月二十二及二十三日至保加利亞首都索非亞出席華約政治高峯會議。會後並發表文件，建議美蘇從一九八六年一月一日起凍結已部署在國內外之傳統武器數量及現代化；並一致反對發

展、試射及部署攻擊性之太空武器（包括禁止反彈道飛彈，中程核武及化學武器之發展）；重申締結華約及北約互不侵犯協定等。其傳播媒體並一再重申戈首於巴黎所提裁核百分之五十的建議。

(二)就蘇聯自身立場來看，戈首正加緊改善並樹立其在國內及華約盟邦間之新形象。他自本年三月十一日出任蘇共總書記後，在政治方面展開一連串大膽行動。首先在蘇共中央政治局方面提升四人為政治局委員，二人為政治局候補委員，並將二人從政治局委員名單中除名；在中央書記處方面亦提升三人；其次在蘇聯政府組織方面，至少已更換了部長會議六十多位部長中的十位，包括外交部長在內。戈首在赴巴黎訪問前，於九月廿七日任命中央委員會掌管經濟事務的書記兼政治局委員雷日科夫（Nikolai I. Ryzhkov）為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十月十四日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兼國家經濟計劃委員會主席白科夫（Nikolai Baibakov）因病去職，戈首復任命主管東歐經互會事務委員會主席兼部長會議副主席、現年五十六歲之塔里金（Nikolai V. Talysin）接掌，並擢升其為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此一人事安排亦充分證明戈首大力推動蘇聯未來經濟計劃的決心。十月九日蘇聯公真理報刊出蘇聯經濟計劃重要部分，其中透露截至西元二〇〇〇年蘇聯發展消費品生產的新綜合計劃，將改善供給與服務和消費的品質，並估計至一九九〇年時生產消費品至少將增加三〇%，至本世紀末將增加八〇（一九九〇年）和截至二〇〇〇年時期的蘇聯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基本方向草案。戈首在會上稱，希望蘇聯國民收入和工業生產在未來十五年中能增加一倍，意即每年能有四·七%的成長率，而目前蘇聯經濟成長率為三·五%。兩相比較，可見戈首對經濟改革並無質的重大突破。

(三)人權問題：蘇聯絕不會讓步。自八十年代以來，蘇聯對各種國際問題之討論均採溫和姿態，惟提及人權則立即翻臉。因此，法總統密特朗訪蘇及此次戈巴契夫訪法時，每當提及人權問題，蘇聯必毫不客氣的反目。

(四)有關區域問題。自本年二月以來美蘇雙方已就各區域問題廣泛進行討論，諸如中東、阿富汗、非洲南部、中南美、東南亞等。揣其目的，蘇聯一方面似在製造對美之困擾，另一方面是在增加其可用籌碼，增加實力。凡此均值得研究國際問題者所注意。

### 李國雄先生：

中共的外交政策，特別是對美蘇兩個超級強權，主要是受到下列兩個因素所影響：一是其內部政治情勢的演變，其次是世界局勢的發展對中共本身國防安全態勢的影響，與中共領導階層所作的評估。首先說內部的政治因素：從一九五〇年代中共所進行的大躍進或砲轟金門，事先都未曾與蘇聯諮商，直接導致中蘇共的分裂；再者「文革」期間紅衛兵的暴亂，引發了仇外意識，並撤離所有駐外使節，停止所有重要石化工廠的興建……等等，皆反映中共內部路線鬭爭的結果對外交政策產生了實質的影響。就第二個因素而言，中共在七〇年代中期以前，一直擔心它的國防安全，惟恐與美蘇兩國發生軍事衝突，但是從八〇年代初期開始



，中共在「獨立外交」的指導原則下，採取對美蘇的等距離外交，在三角關係的互動上，漸居於主軸的地位，使得它對美蘇的關係漸獲改善；另一方面，原先中共所感受到的蘇聯威脅，亦因蘇聯內部的經濟難題，與東歐集團關係的惡化和美蘇的全球對抗等問題，而減輕到最低限度。因此，內部的暫獲穩定，外交環境的改善，以及蘇聯困境的加重，皆使中共在對外關係的拓展上，採取更積極而又更有信心的作法，希望在免於外敵入侵的有利環境下，全力發展其外交策略，強化其「國家利益」，並有助於「四化的進行。」

基於上述兩個因素的分析，我們可以預測，除非在可見的未來，中共政局出現意想不到的變化，否則中共與美國的關係仍將在既存的基礎上發展。其間或許會因某些問題，諸如紡織品配額、軍事科技的轉移或核子反應爐……等，而有週期性的起伏，但是由於雙方的關係已漸趨「制度化」，料將不會有重大的轉折；特別是中共在經濟發展上需要外國的科技、顧問、信用貸款、和市場，而且程度將愈來愈深，故在外交上更難突然轉向，而這正是美國官方及學界重視與中共從各方面進行交流的重要原因。同時，中共內部的官僚體系及某些團體都可能成為門戶開放政策下的受益者，這也有利於中共與美國關係的維繫。

針對中共與美國的關係，我們應該注意：中共利用各種機會刻意突出所謂「臺灣問題」的重要性。中共「外交部」在最近布希副總統訪問北平時，更發表聲明指出，「臺灣問題」是雙方關係發展上的唯一障礙。事實上是否如此呢？這應該是我國對美外交上的一大挑戰，我們固不必期望中共與美國的關係會發生任何對我有利的變化，但是我們却應該積極努力，防止美國在臺灣問題上，再作任何讓步。特別是假如中共內部繼續維持穩定，經濟改革獲得實質的成效而帶動企業的進步，則面對中共不斷地要求美國在「國共和談」上扮演一個催生者的角色，我們將如何應對？在一個不同於雷根主政的未來美國政府，它對此一問題的態度，又將如何？皆值得我們注意。

就中共與蘇聯關係而言，衆所週知，早期的中蘇共衝突，含有濃厚的思想、路線衝突的性質，其後更加入了雙方在亞非地區利益上的衝突。因此近三十年來，雙方在心理上已根深蒂固的築起一道鴻溝，要使雙方關係正常化，而恢復五十年代中期以前的緊密，事實上不但不可能，雙方更皆未作此想。

中蘇共除了意識形態的爭端沒有可能化解之外，由於中共近年來對第三世界的重視，要想成為第三世界當然的領袖，其企圖頗與蘇聯的利益相衝突；而蘇聯在亞洲的積極擴張，對中共利益亦構成威脅，這些也是使雙方和解的進展不可能有重大突破的重要因素。當然，在目前及可預見的未來，雙方的關係皆會繼續在文化、經濟及外交上獲得改善。

呂亞力先生：

我認為中共、蘇聯、美國三角關係牽涉幾個基本問題：

(一)美蘇關係假若改善的話，是否必然會減少美國對中共友好的程度？相反地，美蘇關係惡劣的話，是不是必然會增加美國與



中共之間的友好程度？我認為，從前布里辛斯基等人贊成玩「中共牌」的看法完全是基於一個層次，如果從多層次去看，這個假設未必成立。

(二) 中共本身實力能否增加，影響它的對外關係。如果中共實力增加，就會在臺灣問題上對美施加更大之壓力；沒有實力的話，壓力也沒有用。

(三) 我們對美國依賴的問題。最近經濟部次長去美談判回來後，建議說我們在經濟上太依賴美國。這不僅在經濟與貿易上，在外交上也是一樣的。通常我們談到外交，可分為主動的與被動的。剛才幾位先生的報告都很有趣。但我有一個感覺即中共有美國牌，又有蘇聯牌，又有臺灣牌，那麼我們也必須要有一個牌。今天我們主動愈少，將來愈被動。所以我們今天一定要考慮那裏能主動。我們要動腦筋，將被動變為主動。如果覺得自己籌碼太少了，也是太悲觀的看法。換一個角度來看，儘管小也要靈活運用，我們應該把研究成果化為實用。

謝復生先生：

從過去三、四十年的經驗看來，美、蘇關係雖時而和緩，時而緊張，其對峙之局則未嘗稍變。由於美、蘇關係有其恆常不變之處。因此，談到美、蘇、中共三角關係，中共這個變數就格外引人注目。其中，中共對外政策的目標是一個要點。

中共近年對外政策的主要目標仍不外乎鄧小平在一九八〇年初所言之反霸、「統一」、四化三件大事，外加內部安定一事。當然，就中共決策者而言，這幾件大事所蘊涵之意義已稍有不同。不過，大體言之，它們仍應是中共對外政策之主要考慮因素。例如，對兩霸——尤其是蘇聯這一霸——中共的態度已有微妙的變化。但是，就反霸所代表之安全考慮言，這無疑仍是中共當權者必須時時注意之事。

大體言之，安全、「統一」、四化及內部安定仍應是——而且在未來相當時日亦將是——中共對外政策的主要目標。果如是，我們很難想像中共對美、對蘇關係會在最近將來發生急遽的變化。一方面，中共在安全、「統一」及四化等工作上，自美國得益甚多；儘管資本主義的一些觀念、作法，對中共內部安定會有些許影響。不過，至目前為止，其與美國之關係似乎仍是好處多於壞處。因此，我們很難想像中共會急遽改變其與美國之關係。另一方面，自一九七八年底十一屆三中全會起，中共將對內政策之重點定在經濟工作上。依其所言，要發展四化，需有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在這個前提下，它自然會試著改善與蘇聯的關係。然而，由於蘇聯、中共雙方芥蒂已深，雙方要回復過去那種親密的關係，顯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既然中共態度如此，而美、蘇相互對峙之局及其對中共之態度也不會輕易改變。因此，個人以為美、蘇、中共三角關係在可見的將來，大體上仍將延續八十年代的軌跡，而不會有劇烈的變化。

八、補充發言：

「中共、美、蘇三角關係發展趨向」學術座談會紀要

趙春山先生：

我想提出一個問題，不知在座外交部的先進能否答覆。我們與中共之間的關係是否一定處在一種對決狀態下，有沒有在任何一種環境情況下，雙方皆能獲得利益？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我們是否可用什麼樣的方式來製造這種環境。

丁懋慈先生：

美與中共建交之後，美國在魚與熊掌不能兼得之下，有三個擔心的問題：（一）臺灣宣布獨立；（二）臺灣發展核武；（三）臺灣與蘇聯發生關係。對中共而言，中共對以上各點也不惜動武。對蘇聯而言，我們不要過分將自己地位抬高，認為我們願意和蘇聯發生關係就可以，實際情況是很困難的。因為蘇聯最高的政策就是希望再恢復與中共修好，如果與臺灣發生關係，就等於切斷了這個希望。所以無論我們是明牌、暗牌，我們都走不通。

王承宗先生：

我的引言報告基本上是對當前美中（共）關係做一扼要簡單之概述，並未做深入詳細的報導。關於「一大障礙，三大問題」是中共駐美大使韓敘所提出的。韓敘今年剛到華府上任第一個公開提出的問題即是「臺灣問題」。以時間而言，一大障礙——「臺灣問題」，是美中（共）關係間長期性的問題，也是短期間無法解決的一大障礙。在策略的處理過程中它可提，也可不提，但這是基本障礙問題，必須擺在前面。而當前必須優先解決的，當然是外貿赤字與紡織品設限等問題。障礙問題現在不能馬上解決，但又不能不提。因此我將其分為兩種性質。

關於我們是否能打蘇聯牌的問題，我認為仍是有探尋的餘地。根據我們了解，美國一向非常注意我們與蘇聯的動向如何。例如，蘇聯輪船到臺灣來卸貨，美國馬上就注意到。美國學術界也深切了解，蘇聯的學術界對臺灣的經濟發展，對臺灣某些活動也非常關切，甚至他們還向美國學者尋問臺灣內部發展狀況。我們是可以「打牌」的，但在這以前必須做某種程度的探測，去尋求。如果我們永遠不去尋找，不做主動的發展，我們將永遠處在被動、挨打的形勢中。今天我們在外交政策上必須有一彈性的運用；在國內的武力發展上，必須有一長期的計劃，這必須取決於我們最高當局。

蘇起先生：

我就趙威先生與賴澄民先生提到的兩點做一簡單之說明。趙兄提到美國赤字問題是否影響美蘇和解動機？個人認為有的，但相當小。因為美國之赤字相當大，在整個國會中瀰漫著一種缺錢的氣氛。但是國防預算和雷根所提出之要求相差不大。因此對雷根所做的決定，影響不大。從另一角度來看，美國「星戰」計劃的花費實際上並不多。因為「星戰」防衛計劃可分三個階段：第一個是爬升的階段；第二個是在大氣層以上的階段；第三個是進入大氣層以後的階段。而蘇聯最懼怕的是大氣層以內的階段。這個花費並不多，根據估計，在五、六年之內只要花六十幾億美元左右即可達到。另外爬升階段，五、六年之內也是六百億美元

不到。最困難、花費最多的是大氣層以上之階段，現在還未到達。我認為錢的問題對和解本身並無直接的影響。至於人權問題，我同意基本上蘇聯仍不會有太大的讓步，但是有時仍會稍微放鬆一下。例如准許沙卡洛夫之妻到美就醫就是最好的例證。

尹慶耀先生：

個人認為戈巴契夫政權已相當穩固，他從三月間上臺，到十月時不過才七個月，已大批更動政府人事及地方黨幹，高級軍幹也在陸續更換，那是他以前幾任總書記都不曾辦到的。

我們不能以史達林時代的眼光，觀察現今的蘇聯，黨內幹部由代表大會選舉中委，由中央全會選舉政治局委員，應有一定程序。戈某調整黨中央人事，目前大部係遞補缺額。

戈某新拔擢的幹部比較年輕，但若干老人仍留在政治局或書記處，明年二月廿七次大會後，仍會有若干老人留任，但我不認為老年幹部一定反戈或與年輕幹部對立。

在戈上臺後新任的政治局委員兼中央書記里加科夫，擔任組織、黨活動及思想理論工作，又兼任蘇聯最高蘇維埃聯盟外交委員會主席已成為第二號人物。工程師出身、曾任國家計劃委員會第一副主席的雷日科夫，也被擢升為政治局委員仍兼中央書記，主管經濟，最近又接替吉洪諾夫出任總理。原任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的契布里科夫由政治局候補提升為正式委員，顯然是要用他那秘密警察的力量整肅紀綱。謝瓦納滋也由政治局候補擢升為正式委員並出任外交部長。索科洛夫出任政治局候補委員，是由於他的國防部長職位。尼可諾夫畢業於農業學院，曾任農業部副部長，一九七六年起為蘇共中委，戈任內提升為中央書記，仍主管農業。六月間起用四十九歲曾任省黨委第一書記的拉茲莫夫斯基為黨中央組織、活動部長。對列寧格勒省軍需工業的發展有長期貢獻的羅曼諾夫引退後，將該省黨委第一書記、蘇共中委札伊科夫擢任中央書記，可對軍需工業具有若干安撫作用。此外，還有葉里岑也升任中央書記，他也是工科大學出身，一九八五年四月起，就擔任黨中央建設部長。就上述人事安排而言，戈某新擢升的幹部，都掌握了重要職位，而且對戈某推行改革有所助益，因此我們認為他的政權已相當穩固。

關於中共和蘇聯的關係，個人認為中共於一九八二年提出「三大障礙」之說時，就已從原來的立場上退却。

回憶一九六九年十月中共和蘇聯在北平的「邊界談判」開始之前，中共發表了很長的聲明，其內容要點是：(一)中共不要蘇聯歸還帝俄時代根據條約割佔的中國領土，甚至「爭議地區」的領土，中共也可再讓出一些，但堅持蘇聯必須承認過去的條約，是不平等條約；(二)將來要以新約代替舊約，勘界立碑。意思是說中蘇邊界尚未固定；(三)在邊界問題尚未獲協議前，雙方軍隊脫離接觸。這是為了減輕蘇聯的軍事壓力。如今「三大障礙」，不再提及條約和邊界問題，只剩下一個安全（即軍事壓力）問題，豈不是一項退却？由此看來，「三大障礙」之說，實不必過分重視。

中共和蘇聯之間的多種交流，並非全屬「玩牌」性質。例如邊境貿易全面恢復，就意味著邊界安謐，短期內中共不會受到蘇聯的軍事威脅。目前雙方正就中共利用西伯利亞鐵路作貨運進行談判。又中共所謂「北疆鐵路」，由烏魯木齊到烏蘇的第一期工程已開始敷軌，第二期工程，就通到蘇聯境內。中共的目的，雖然是要和蘇聯、東歐加強貿易。而經濟貿易的合作，對實質關係的進展所發生的作用，是不容忽視的。

我們可以肯定地說，中共和蘇聯不可能恢復五十年代的親密關係，而且關係改善的步調，會極其緩慢而曲折，但它們之間接近和改善的事實，仍然值得我們警惕，而不宜一筆抹煞。

## 國際問題講演集

25開本 全一冊

本集所收，為國內外學者在本中心（所）所作專題講演與討論之紀錄，內容則全存原貌，對於若干特別問題，尤具參考價值，所收資料自民國六十二年起到七十一日止。全書三十餘萬字，計四四二頁，實售新臺幣二〇〇元（國內郵購每冊另加郵掛費十二元）。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編印  
郵撥：〇〇〇三四三六一二號帳戶